

电视剧《蜗居》的女性主义观照

任天华

摘要：《蜗居》中的海藻坚持走自己的路，却成为男人的牺牲品，同时也被城市物质生活腐蚀着。自我不能成为爱情向婚姻妥协的承载体，物质更不应当变成异化女性主体意识的“刽子手”。坚守一种在世界面前和在世界之内的批判性和反省性是女性成长的途径之一。

关键词：女人；男人；城市

作者简介：任天华，女，讲师。（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 文化艺术学院，山东 烟台，264000）

中图分类号：J9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8-6552 (2010) 02-0065-05

根据作家六六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蜗居》在全国各大媒体上热播，引起了广泛争议和讨论。根据片名，顾名思义，“蜗居”应该是关于房子的故事。事实上，整个情节也的确是围绕房子来结构的。但是在我看来，房子仅仅是一个由头，故事主要是以海藻、海藻姐妹两人的家庭、情感、婚姻和爱情为主要内容来展开的，更确切地说，作家似乎是以海藻为核心，对女人进行反思和审视。

海藻是这部电视剧中最有争议的一个人物。因为她在剧中有着特殊的身份，而这种身份恰恰是不被道德和世俗所认可的——“情人”。虽然谈不上什么姿色，但是却也年轻靓丽；虽然大学毕业，但是却要经常换工作。她是很简单的一个人。像所有的小白领一样，她也熟知各大品牌，也爱吃哈根达斯，但却舍不得买。而正因为年轻，她可以不用像姐姐一样天天为了买二手房还是买新房而焦虑，正如男朋友小贝说的，他们可以在一两年的时间里攒一些钱，再加上“你爹”、“我爹”的支援就可以买一套“蜗居”了。原本或许海藻会像大多数人一样这样平平淡淡地走过自己的婚姻，但是在目睹姐姐为了“一块钱”与姐夫争吵得面红耳赤、为了省钱买房子而天天吃挂面的情景之后，她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疑问：“而我和小贝，也会这样吗？而我以后，也会变成姐姐吗？”海藻说：“这世界上有两大毒草，一是莎士比亚，另一个就是琼瑶，这两个人最坏的地方，就是把无知少女给误导了。”也许正是为了避免自己被“误导”，海藻踏上了一条不同于普通正常女人的人生之路。海藻的悲剧是必然的。

一、男人和女人

海藻在公司应聘的是文案工作，可是却要老板要求不仅做内勤、外勤，还要陪客户吃喝、陪唱歌跳舞，甚至是被老板当作礼物供奉给公司的“财神爷”宋思明。而宋思明的身份和地位足以使他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是却由于海藻那“心不在焉”的梦游娃娃一样的神情激起了他内心深处最原始的冲动和青春年少时的梦想。成熟稳重、身居高位、深谋远虑、幽默睿智，这样的中年男性正是每个妙龄青春女子的“梦想”！梦想与“梦想”碰撞到一起，产生了激情与互补，也带来了海藻的悲剧性人生。

海藻的自我意识是一点点觉醒的。在大学毕业之后的最初几年里，她没有太多的生活阅历，对自己也没有一种自我主体意识。海藻见证了姐姐从爱情到婚姻的整个过程。第一次见姐夫的时候是姐姐大

二的寒假，姐姐带着苏淳从上海回到老家。他们一起聊电影艺术文学绘画，讲动听的历史故事，分享一个红薯。才几年啊！那个英俊的大男孩变成男人了，背有点弓，脑门开始有点亮。而姐姐，美丽的姐姐，从依人的小鸟轻声细语，身材曼妙，到怀孕的水桶，再到现在穿乳罩要把乳房拽进乳罩里，说：“给吸下垂了。”然后大声地说话，经常训斥那个她曾经崇拜得像王子一样的男人。爱情是什么？婚姻难道真的是爱情的坟墓？海藻的今天就是海藻的明天？海藻找不到答案，没有人告诉她应该怎么做。直到有一天，宋思明出现了。宋思明告诉海藻：其实，你可以有另外一种活法。于是，海藻情不自禁地走向了镁光灯下的光鲜亮丽，奢华背后的沉重可以视而不见，因为它至少还有一种希望。

既然选择了新的活法，就要与过去断裂，尽管可能很疼。其实，就算是没有宋思明的故意使坏，在与海藻约会时偷偷接小贝的电话以致引起小贝的怀疑，海藻也不可能与小贝走到一起。自从海藻因为着急替姐姐还高利贷而向小贝借钱导致小贝怒吼相向的那一刻，小贝已经在海藻心中成为了陌生人。当海藻说出“我还不是你的什么人，从今以后，我不会再向你提钱的事”，失望的泪水夺眶而出，绝望的她冲下楼梯，可是偌大的城市却没有她的栖息之所，黑夜茫茫，她能到哪里去呢？她没有自己的房子，所以她只能乖乖地回到小贝身边。或许就是从走向宋思明的办公室向他借钱开始，海藻心中对自己的活法已经作出了选择。因此，尽管最终小贝离自己而去，海藻又怀上了宋思明的孩子，姐姐包括母亲在内都劝她回头，她都依然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这不仅是她与宋思明之间爱的见证，更是她试图创造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表面上，海藻以为自己已经具备了独立选择的自由意志，但其实她只是一个主动的“客体”而已。海藻的生活注定是没有明天的。

海藻与宋思明的所谓“爱情”是导致海藻悲剧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正如宋思明的妻子所说，男人“年轻时候需要垫脚石，中年时就需要强心针，到老了就要扶着拐棍。”对海藻来说，做稳了的“情人”角色注定只能充当“强心剂”的作用。在宋思明那里，有些事情就是老婆干的，比如洗衣服、做饭，而情人呢，只要她快乐，或者说使他快乐就行。不容否认，宋思明对海藻的爱确有真诚和真心在其中，但是这种爱的方式却只能最终导致海藻窒息。这是一种专制的、畸形的爱！不仅仅在工作上，宋思明喜欢安排一切，就是在与海藻的性关系上也是这样，他需要的时候打一个电话，不容海藻说“不”就要即刻见到海藻。海藻遇到任何困难，在他那里都能轻而易举解决，久而久之，使海藻对他形成一种依赖。本来海藻还有一点不安，但是伴随着欲望的膨胀和人性的迷失，她彻底丧失了自己的主体身份，心甘情愿地充当起“附属”的角色。买家具，她可以舍弃自己喜爱的“宜家”风格，附和宋思明的“欧美”古典派；生孩子，她可以放弃自己的利益，为了男人的一句“喜欢”不负责任地创造另外一个小生命。在剧中，宋思明不止一次地对海藻说“你是我的女人”。在这里，作为男人的宋思明把海藻——女人当成了自己的私人财产，而海藻不仅没有感到羞辱，反而欣然接受为一种“得意”，而爱情再次充当了蹩脚的“遮羞布”。女人在男人眼里成为与权力、金钱同质的“物”，丝毫不具有主体性认知和话语权。对海藻来说，如果宋思明工作上不出现问题的话，她也许会永远得意于禁锢在“笼子里的金丝雀”，时间久了，或者是根本就没有飞出去的愿望，或者是翅膀已经麻痹失去飞翔的功能，想飞也飞不动了，即使笼门洞开着！

另外，“处女情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个“痼疾”。著名女性主义学者西蒙娜·德·波伏娃指出：“将女人奉献给贞操，它多多少少公开承认男人的性自由。而女人却被限制于婚姻，在男权文明统治下，没被制度和律条所允许的性行为，对女人来说，是一种过失、堕落、失败和弱点。”^[1]如果说对于传统的女性来说，“处女情结”早已经固化在她们的内心，那么在这一点上，海藻却可以暂且被认为是一个“现代”女性。当然，海藻也许并未清醒意识到男人的“处女情结”。文本里，当海藻无意中意识到宋思明一直认为自己还是处女而把自己“视作心头的珍珠”时，她并未反驳。这种沉默可以视作“无所谓”，也可以诠释为“逃避”。或许我们无法证明海藻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贞操观”，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发现现代女性对于所谓的“贞操”的一种态度。胡适先生早就说过：“贞操是一个‘人’对别一个‘人’的一种态度”。^[2]男人可以秉持“贞操”的大旗“顺理成章”不顾自身的贞洁狂情滥爱，这种贞操观本身就是一种双重标准。而作为一种态度，女人也可以将这种标准简单化、策略化。弗洛伊德在分析处女情结时曾说：“要求女孩子婚前不得与其他的男性发生性关系，以免留下回忆盘踞在她们心中——这只是把垄断女人的行为延伸到过去的时间里罢了。”^[3]既然这只是一种时间的战略，那么女性的过去是否可以获得一种逃避，有时候逃避也是一种获取平等权利的“态度”。其实，宋思明的“处女情结”是他决定长期拥有海藻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男人的审美意识中，“处女之美”是女性美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对处女的崇拜和期待正是宋思明“垄断”海藻的一个前提。在剧中，宋思明曾经不止一次地独自遐想海藻那纯洁如处子般的美丽场景，当他借助酒精的兴奋和夜色的朦胧第一次强行占有海藻之后，海藻由于例假提前而流出的经血被他误认为是“处女之血”，被“假想”蒙蔽和被“幻景”欺骗着的宋思明认为自己已经“完全”和“彻底”地占有了一个纯洁的“处女”。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海藻只是一次侥幸的偶遇。但是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处女情结”是一种男权专制强加给女人的伦理观念，是外在于女人生命本体的附加物。既然我们在短时期内无法撼动封建贞操观念的大树，我们何不“借力发力”，为自己获取平等而预设一种“时间”战略。当然这种战略只能是暂时的，因为没有一种健康、自由、平等的贞操观念来取代男权的“处女膜拜”情结，女人将永远无法获取“人”对“人”的尊重。

海藻与宋思明之间的关系或许还有一层是我们应该加以分析的。剧中海藻几次在不同场合提到宋思明的“老”，而且海藻一直在强调海藻对自己的疼爱，甚至是把海藻看作是自己的母亲一样，对自己的父亲始终没有提及，父亲的形象对海藻来说就是一个“在场的缺席者”。这样一个青春朝气的年轻姑娘在碰到老谋深算的宋思明时，不免会带有一种“恋父情结”在其中。从最初对宋思明的崇拜、报恩、依赖到信任，海藻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安全感”。海藻由于给外国人上课获得课时费而精神振奋，感到有了寄托，海藻说海藻是有了安全感。海藻需要的也是一种安全感，小贝显然不具备这个资格，宋思明的出现恰逢其时。不论是从年龄还是从学识和阅历上来看，海藻与宋思明都是两个年代的人。或许正是带着“恋父情结”的意向，海藻懵懵懂懂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事实证明，海藻的“安全感”其实并未给她带来安全。

二、女人和城市

作家王安忆在写作《长恨歌》时，曾经说过，她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作家其实是要写一个城市的故事。但其实这也是一个女人与城市的故事，《蜗居》毋宁说是写城市中的“房事”，不如说是女人与城市、确切地说是与物质的纠缠。如果说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还带有20世纪30年代老上海的那种精致、优雅、从容，那么海藻则更多了一些21世纪年轻女性的勇敢、热情，当然她同时也缺失了女性最主要的独立意识，而这或许也是导致她最终身心俱伤的致命原因。

海藻是一个普通人，她生活在这座城市中。她并不企图创造一种惊心动魄的宏大历史，而只是想创造自己，创造自己的日常生活、创造所有普通人最本质的物质需要。物质对于每一个女人都有致命的吸引力。城市中的日常生活就是靠女人和她们的欲望、追求和向往编织起来的。当她们遵循自己的欲望和追求去实现自我价值的时候，城市却并不领情。

当海藻离开小贝奔向宋思明时，她要的不是“妻子”的身份，起初也不是为了爱情，她只是为了在城市中能过上满意的、富足的、风光的生活，为了能为姐姐买房子而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城市中的每一盏霓虹灯、每一件华贵的衣裳、每一口美食都足以让海藻心醉神迷，她愿意用自己的青春和身体

去偿付和等待，她是做好了准备的。其实，这个城市的每个人都是做好了准备的，不论男人还是女人。宋思明可以用自己的身家性命去换取权势和金钱，姐夫苏淳可以冒着泄露公司机密的危险接“私活”，作为知识分子的海萍可以因为几滴油与底层小市民大吵大闹，小贝可以为了不借钱给海萍还高利贷而对海藻咆哮，底层贫民李老太可以为了讹一套两居室的房子而命丧黄泉，就连衣丰食足的宋思明的妻子见到暗红的实木餐桌时也忍不住被那散发着的贵族气质深深地吸引。在这个城市中，物质拥有独立于权力的影响力。只不过女性可以在城市的物质关系中物化她的性。当海藻的性获得物质的形式之后，她对宋思明的性依赖关系就不复存在，就转化为对物质的依赖关系，而这种对物质的依赖和需要，恰恰是城市生活最日常化的具现。“女人和城市的纠缠有性的纠缠，归根到底还是物质的纠缠。”^[4]正如海萍对海藻说的，“男人若真爱一个女人，别净玩儿虚的，你爱这个女人，第一个要给的，既不是你的心，也不是你的身体，一是拍上一摞票子，让女人不必担心未来；二是奉上一幢房子，至少在拥有不了男人的时候，心失落了，身体还有着落。”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很世俗的价值观，但是在城市这样一个谁也不是权力主宰者、物质才是决定人的命运的空间，人对物质的追逐、对日常生活的关注的的确确体现了一种正日趋被人们接受的世俗美学。它肯定了一种又一种城市欲望渴求及梦想，甚至包括庸俗可笑与低俗不堪，充满浓重的油烟胭脂和俗不可耐的物质依恋；在时间指向上却敞向未来，似乎总是没有停顿，充满了向前方、向未知推进的意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在物质和情欲中“飞翔”的海藻似乎无可厚非。这不仅肯定了物质、情欲对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也或许体现了城市的现代化魅力和一种更高的普遍价值。

物质是城市的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是一个不断被书写与反书写的过程。人创造了物质，物质也在创造着人。女性与物质的天生依赖关系导致女性在物质文明面前面临更多的诱惑，同时也需要更多的反思。如果说海藻是以自我去赚取物质利益，以二十多岁的身体作赌注去交换婚姻并试图获取自我的主体确认的话，那么这种赚取与交换的代价未免太沉重了！再进一步说，当女性交出自我和身体获得权利兼之获得主体意识时，她们的主体和权利又是以什么来衡量呢？这似乎成为一个悖论。唯一的解决之道只剩下“退守”。于是，海藻说，“如果我的生活像一卷录影带一样，我一定要找到我22岁时的那段带子，我一定要重新……重新播一遍。那时候我就会选择，和我的爱人，回到老家，买一套不大的小房子。和我的孩子，和我的爸爸妈妈在一起，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可能那种生活，才是我想要的，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那么简单。”宋思明也说，“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会带着你们过另一种生活，不要太多的钱，每天去菜场斤斤计较，为发论文、评职称而与人争得面红耳赤，也为女儿考不上好学校而心焦。也许，这样，才是一种幸福的生活，而我以前并没有意识到。”在这个日益深化的世俗世界面前，我们需要的不是退守，也不可能再回到过去，即使再重新选择一次，我相信，生活在城市中的男人和女人还是会作出相同的选择。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需要的是建立一种与这个繁华的世界相平行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包括能够覆盖、包涵这个世界，接受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所提出的种种陌生性的挑战；同时更加重要的，需要与这个世界保持一种真正的张力，能够坚守一种在世界面前和在世界之内的批判性和反省性，尤其能够找到富有建设性的某些维度和途径，而不仅仅是“解构”。

女性在日常化、物质化的场景中获得了无限可能的主体解放。城市的物质生活方式使更多的海藻们充满了青春活力，充满了自我实现的欲望，也充满了能够自我定位、获取自我认知的信心。但是在消费时代，作为性与欲望的符号，女性依然有可能无法摆脱“被看”与自我异化的处境。如果没有一份自我坚守的话，那么注定女人依然会成为牺牲品。当然坚守不是所谓的退却与逃避，而是一种主体性的确认与角色的认同。坚守是为了成长。对于海藻们来说，自我不能成为爱情向婚姻妥协的载体，物质更不应当变成异化女性主体意识的“刽子手”。或许，海藻们的无奈与困境也正是女性在现代文明场景中的性别境遇，但是这种尴尬如果使女性变成自我无可确认的镜像，那么这将是一种“致命的飞

翔”！

男人与女人充满了无限的纠缠，女人与城市充斥了太多的迷乱。更有意味的是，最后导致海藻身体遭受毁灭性摧残的人竟然是另外一个女人——宋思明的妻子。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女性之间的相互仇视和“怨恨是人类苦难最深重普遍的形式，它是支配者强加在被支配者身上的最糟糕不过的东西”。^[5]男性中心的后果之一就是极易使人造成错觉，以为女性的悲剧是女性自己造成的。子宫是母亲的象征，一个已经做了母亲的女人亲手剥夺了另外一个女人做母亲的权力，原本是男人的罪恶最终却要由女人之间的互相争斗来买单，这是男人的悲哀，更是女人的不幸！

在这个城市里，女人要如何拯救自己？或许就像海藻讲的那个小故事一样：

小蜗牛问妈妈：为什么我们从生下来，就要背负这个又硬又重的壳呢？

妈妈：因为我们的身体没有骨骼的支撑，只能爬，又爬不快。所以要这个壳的保护！

小蜗牛：毛毛虫姊姊没有骨头，也爬不快，为什么她却不用背这个又硬又重的壳呢？

妈妈：因为毛毛虫姊姊能变成蝴蝶，天空会保护她啊。

小蜗牛：可是蚯蚓弟弟也没骨头爬不快，也不会变成蝴蝶，他为什么不背这个又硬又重的壳呢？

妈妈：因为蚯蚓弟弟会钻土，大地会保护他啊。

小蜗牛哭了起来：我们好可怜，天空不保护，大地也不保护。

蜗牛妈妈安慰他：所以我们有壳啊！我们不靠天，也不靠地，我们靠自己。

是啊，我们只能靠自己，女人或许此刻已经清醒了，但是她“已经回不去了”，只能一直向前走，即使前方的路途坎坷。

参考文献：

[1]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 女人是什么 [M]. 王友琴, 邱希淳, 译.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8: 170.

[2] 胡适. 贞操问题 [J]. 新青年, 1918 (5).

[3] [奥地利] 弗洛伊德. 爱情心理学 [M]. 山东: 作家出版社, 1986: 146.

[4] 荒林, 王光明. 两性对话: 20 世纪中国女性与文学 [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196.

[5]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 [美]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 [M]. 李孟, 李康,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278.